

东南孔道

——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
商品经济研究

王万盈 著



海洋出版社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新航路开辟后浙江的对外交流与经济文化新变动”(06JDHY001ZD)最终成果

东南孔道

——明清浙江海洋贸易研究

王万盈 著

海洋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内容摘要

明清浙江商品经济较宋元有较大发展,此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浙江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则与世界海洋贸易发展大势互为因果。尤其是新航路开辟后,中西交通形势为之大变,全球海洋贸易开始出现频繁互动态势,欧洲对东方商品的需求与中国对白银的渴望互动结果给浙江海洋贸易长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明代贡使贸易与走私贸易向清代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多元化态势的转化,更是新航路开辟后浙江海洋贸易出现的新动态,从而把明清浙江社会进一步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同时也促进了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洋社会的形成。如何从海洋贸易和商品发展互动视角动态研究浙江海洋贸易,客观估计鸦片战争前的明清浙江海洋贸易在东南沿海贸易带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属于本书的关注点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研究/王万盈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9.7

ISBN 978 - 7 - 5027 - 7506 - 3

I. 东… II. 王… III. 沿海 - 对外贸易 - 经济史 - 研究 - 浙江省 - 明清时代 IV. F75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1619号

责任编辑:陈莎莎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5

字数:310千字 定价:48.00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导论 宋元时期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概况·····	(1)
第一章 明代浙江商品经济发展概论·····	(23)
一、明代浙江商品经济发展概述·····	(23)
二、商税与明代浙江商品经济·····	(34)
第二章 明政权的海洋政策与浙江沿海的海洋贸易·····	(47)
一、明代海洋政策的嬗变·····	(47)
二、明代浙江对外贸易概况·····	(57)
三、朝贡背景下的明代中日经贸政治关系·····	(72)
第三章 新航路的开辟与明代浙江海洋贸易的发展·····	(106)
一、新航路开辟后的浙江海洋贸易态势·····	(107)
二、嘉靖倭乱与明代浙江海洋贸易的反动·····	(115)
三、明代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互动·····	(136)
四、海洋背景下的明代浙江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149)
第四章 清初“海禁”政策与浙江贸易通道·····	(161)
一、清初东南形势与海禁政策的肇始·····	(161)
二、清代海禁的弛解与海洋政策的递嬗·····	(172)
三、清代浙江海洋贸易通道·····	(193)
第五章 清代浙江海洋贸易与税收·····	(201)
一、清代浙江海洋贸易概况·····	(201)

二、清代乍浦港的对日贸易·····	(219)
三、清代浙江商税与海洋贸易税收·····	(240)
第六章 清代浙江海洋贸易个案研究·····	(254)
一、清代浙江与台湾地区的商品贸易·····	(254)
二、英国在浙沿海贸易与洪任辉 (James Flint) 事件 ·····	(266)
三、鸦片战争前西方列强在浙江沿海的贸易活动·····	(281)
四、清代浙江沿海的“海贼”与海洋贸易 ·····	(289)
第七章 海洋背景下的清代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	(309)
一、清代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	(309)
二、清代浙江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327)
余论 明清时期浙江海洋社会的形成·····	(348)
一、“以海为生”的经济生活方式是明清浙江 海洋社会形成的物质基础·····	(348)
二、外向型生产的出现是明清浙江海洋社会的 又一重要特征·····	(353)
三、海神信仰是浙江海洋社会民众的精神支柱·····	(360)
四、海洋走私与反走私是海洋社会不同利益博弈的表现 ·····	(362)
五、人口流动加快是浙江海洋社会形成的又一表现·····	(367)
六、海洋意识的形成是浙江海洋社会成熟的标志·····	(371)
参考文献·····	(377)
后记·····	(392)

导 论 宋元时期浙江海洋贸易 与商品经济概况

《史记·货殖列传》有云：“浙江南则越……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①清人嵇曾筠撰修《浙江通志》时引用汉晋唐宋典籍对浙江评述的内容，详细叙述了浙江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海洋物产：“《汉书·严助传》曰：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晋书·诸葛恢传》：今之会稽，昔之关中。左思《吴都赋》：江湖陂险，物产殷充。《唐书·天文志》：自南河下流，南涉江淮为吴越，负海之国，货殖之所阜也。《宋史·地里志》：（两浙）东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苏轼《表忠观碑》：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天下，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蛮。欧阳元《江浙行省兴造记》：北枕江淮，西放彭蠡，南极于海，供给当天下半。《图书编》：浙江，古扬州地，崇山巨岭，所在限隔，然嘉湖与江淮相表里，严衢以徽饶为郭郭，左信都，右闽关，大海东蟠绕出淮扬之域，四通八达之区也。”^② 这些描述或有夸张之处，然也道出浙江最大的区位优势就是“枕江负海”。质言之，较为典型的海洋大省与海洋社会是浙江最显著的区位社会特点，颇具特色的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浙江通志》卷二十二《形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地域状况使“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成为明清及其以前浙江特色的代名词^①。在宋代，“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②，“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就已显示出浙江区域经济地位的重要性^③。

毋庸置疑，汉唐、两宋人们对浙江的认识，不仅指出了唐宋浙江商品经济的基本状况，也预示着未来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即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后浙江商品经济的持续高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最终能够跻身全国前列有了可靠保障。明清时期已经发生覆地变化的浙江无论从经济抑或文化上都在继续印证着唐宋政治家对浙江的观察。

退言之，如果唐宋学者对浙江的认识尚处于位置之优越与物产之丰盛层面的话，那么明人对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状况的认识更上一楼，超越了自然环境和物产丰盛的描述，认识到浙江经济与其他地区经济的互补性，把浙江经济纳入全国贸易网络进行考量。如明代学者张瀚论及浙江经济发展概况时就言：“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缁帛者，必走浙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严、衢、金华郭郭徽饶，生理亦繁。而竹木

① 《浙江通志》卷九十九《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九《奏议六首·进单镒吴中水利书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漆柏之饶，则萃于浙之西矣。”^① 细剖析张瀚所论，之中蕴涵几点重要信息：首先，浙江地理位置优越，商品贸易的水陆三条交通路线联结全国，陆路交通以浙东和浙西两线为主干，以区域中心城市为节点沟通全国。如浙东陆路交通以杭州为中心，以茧丝绵苧为商品交易的大宗；浙西陆路交通以严州、衢州与金华为中心，以竹木漆柏等为交易大宗；宁、绍、温、台则是水路运输交通要地，往来于宁波、绍兴、温州、台州等地商人，熙熙攘攘，奔走其间，博取厚利。其次，渔、盐、桑、麻、竹、木、漆、柏等物产是浙江商品交易之大宗，亦是对外贸易拳头产品，这种贸易对内可及内陆临近诸省，对外则可漂洋过海，直达他乡异国。复次，明代浙江经济开放性愈加明显，对外依赖度不断增强，地产粮米不能自给，外地粮食调运入浙不断引起各级政府关注。明清浙江需从他处调运购买粮米现状的形成，是明代乃至清代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海洋背景下浙江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明代浙江对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清代学者对浙江经济地位有了新认识：“浙西蚕桑之利，浙东鱼盐之饶，与江苏相伯仲，故东南财赋必数江浙”^②，“江南财赋，甲于天下”^③。浙江已成为明清重要的财赋重心之一。

明清浙江成为东南财赋重心之一的地位之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唐宋以来社会变革和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毋庸置疑，明清浙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外，与唐宋以降浙江经济的变迁与海外贸易不断扩

①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② 《皇朝续文献通考》（影印本）卷三百十六《舆地考》十二《浙江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③ 《明神宗实录》（校印本）卷二百六十三，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八月乙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大更是关系密切。

早在唐代，浙江经济就已现出勃勃生机，农业生产商品化步伐加快，浙西成为贡茶主产地，每年浙西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缁纈金钗银钏，入山交易”^①。湖州的蚕桑业也较前代有较大发展，唐代茶圣陆羽就曾经在湖州苕溪隐居，史言：“陆羽字鸿渐，竟陵人，天宝中隐火门山，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②茶圣自诩“桑苎翁”恰恰透露出湖州蚕桑业在陆羽心目中重要地位的心理。在湖州各县中，西部、西南部县乡多以植桑和养蚕纺织为业，桑叶生产与买卖比较频繁^③。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越窑出产的青瓷也成为对日贸易的重要商品，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商品的浙江对日海洋贸易更是开辟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新篇章。同样，唐代浙江城市经济也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城镇空间的不断拓展和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诗人更是运用自己手中之笔，描绘出唐代杭州等地繁华的生活景象。如每年元宵节，杭州城就现出白居易所描述的“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的繁荣场景^④。同样，“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更是唐代钱塘江沿岸一带特色商贸集市的真实写照^⑤。这都是唐代浙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对此，学界述之甚多，无需赘言。

到宋代，两浙路经济因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诸多原因影响，商

①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八，《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江南通志》卷一七二《人物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09页。

④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才情雅致》，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⑤ 白居易：《东楼南望八韵》，《全唐诗》第四百三十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业性市镇发展不断提速，商品经济发展开始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草市成为宋代两浙路商业市场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据陈国灿研究，“虽然两浙路的坊场数量在全国 23 路中居第 12 位，但年税收总额却仅次于成都府路而高居第 2 位，可见其个体商业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要高得多。特别是那些兴起于大中城市周围和农村交通线上的草市，商业尤为发达。如熙宁十年（1077），杭州的龙山市、柏坎市，越州的龙山市，常州的岑村市，秀州的金山市、广阳市，温州的路桥市等，年商税额都在 1000 贯以上，几与一般县城相当”^①。同样，宋代两浙路商品经济与商品流通也比唐五代时期有质的飞跃，如嘉兴崇德的濮院市镇商业一度十分繁荣，“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②。位于严州淳安县南三十里的云程墟市，“富者商者鸠焉，其水陆达杭、越，通衢、建，凡舟车日夜之所奔走，皆夺吾山川芳润之实以去之者”^③。这仅仅是宋代浙江内陆商品贸易的一个侧面，而该时期的海洋贸易更是有新发展。

由于“枕江负海”的先天优势，就决定了唐宋以来浙江海洋贸易和海洋商品经济能够得以快速发展。宋代在杭州、明州设置有专门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市舶司。浙江市舶司的设立，标志宋代的国家权力已经开始正式干预浙江地方对外贸易事宜，这种干预一方面说明封建政权尤其是宋政权已经意识到浙江对外海洋贸易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给海洋自由贸易套上国家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枷锁，成为制约和发展海洋贸易的双刃剑。

有关宋代浙江市舶司的废立演进情况，《宝庆四明志》有较为

① 陈国灿：《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浙江师大学报》，2001 年第 2 期。

② 《桐乡县志》（光绪）卷一《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1993 年。

③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五《记·芳润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详细的记载：“汉扬州、交州之域，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唐有市舶使总其征，皇朝因之，置务于浙、于闽、于广，浙务初置杭州，淳化元年徙明州，踰六年复故。咸平二年，杭、明二州各置务，其后又增置于秀州、温州、江阴军，在浙者凡五务。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澈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① 这段资料说明，宋政权虽然先后在杭州、明州、温州、秀州以及江阴军设立市舶司，但唯有明州市舶司却始终保持下来，这一方面得益于明州地处海滨之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明州是宋代沟通日本、高丽和东南亚诸国的重要海洋贸易通道，在此略作述论。

宋代浙江设立市舶司之时间最早应是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该年宋政权在杭州设立两浙路市舶司，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由杭州迁至明州定海，史言：“淳化三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定海县，以监察御史张肃领之”就是说的这件事^②。至道二年（996），两浙路市舶司从明州定海再迁杭州。到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九月庚子，宋政权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客从便”^③。杭州市舶司和明州市舶司开始各司其职。首任管理明州市舶司的是石知颙，这在《宋史》中有明确记载：“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与蕃商贾

① 【宋】罗潜：《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市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五，真宗咸平二年九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易，命知颢往经制之。”^① 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又诏令明州为北宋与高丽进行贸易的口岸。从此明州正式成为宋和高丽两国贸易的主要地区。崇宁元年（1102）七月甲午，宋徽宗又“诏杭州、明州置市舶司”^②。这说明在此期间杭州、明州市舶司曾经又遭废黜，直到崇宁元年再次复置。

那么宋代浙江省舶司在徽宗崇宁元年再度恢复之前又是何时遭废？史书虽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据相关资料作一推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宋真宗下诏规定：“诏杭、明、广州市舶司，自今蕃商贡输石至者，官为收市，斤给钱五百。以初立科禁也，三司定直，斤止钱二百，上特增之。”^③ 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五月，“给事中、集贤殿修撰程师孟乞罢杭、明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司一处抽解。”对于程师孟的建议，三司的意见是“先次删定立抽解条约”，而神宗的意见则是“恐逐州有未尽未便事件，令更取索，重详定施行”^④。这说明至少在神宗熙宁九年前，两浙路中的杭州市舶司和明州市舶司尚在正常运行。就是在这一年，“是年，杭、明、广三司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颗、脐、只、粒”^⑤。三市舶司收支相抵净结余三十余万缗。问题就出在熙宁九年给事中程师孟的奏议上，虽然史料显示三司对程师孟的奏议是修

① 《宋史》卷四六六《石知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② 《宋史》卷十九《徽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五，神宗熙宁九年五月丁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⑤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改市舶司抽税条款，而宋神宗以逐个审核有所不便为由下令“详定施行”。但这个时候两浙市舶司仍未废除，因为在神宗元丰三年（1080）时又将明州作为与高丽进行贡使贸易的主要口岸，因此，最早在元丰三年前浙江省市舶司尚未被再次废除，由此推测浙江省市舶司的罢黜可能就在神宗元丰三年至徽宗崇宁元年期间。

北宋亡后，偏寓江南的南宋小朝廷尚未顾及到市舶司对国家和皇室财政的重要贡献，高宗赵构在建炎元年（1127）六月，“省诸路提举常平司，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①，再次将两浙市舶司废黜。但在一年后的建炎二年（1128）五月丁未，南宋政权又“复置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②。这次浙江省市舶司的运转维持了30多年时间，到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六月甲戌，因两浙市舶司入不敷出而“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③。

值得重视的是，南宋政权曾在绍兴年间（1131—1162）设立温州市舶务，专管对外海洋贸易。虽然南宋朝廷在浙江设立的市舶司时废时立，但在海洋贸易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值得肯定。如哲宗元祐三年（1088），金部员外郎范锴在奏折中讲道：

“询访得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然海商之来，凡乳香、犀、象、珍宝之物，虽于法一切禁榷，缘小人逐利，梯山航海，巧计百端，必不能无欺隐透漏之弊。积弊既久，而严刑重赏所不能禁者，亦其势然也。故上下议论，皆以为与其禁榷，用幸隐匿，归之于私室，莫若

①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②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 《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公然设法招诱，俾乐输于官司，则公私两便。试言其略：一者，板桥市舶之法，使他日就绪，则海外之物积于府库者，必倍多于明、杭二州。何则？明、杭贸易止于一路，而板桥有西北数路商贾之交易，其丝绵、缣帛又蕃商所欲之货，此南北之所以交驰而奔轶者，从可知矣。二者，商舶通行，既无冒禁枉陷刑辟之苦，而其货财亦免有籍没穷悴之忧。非特此也，凡所至郡县，场务课额必大增羡。三省每岁市舶抽买物货及诸蕃珍宝应上供者，即无数千里道途辇运之费，江、淮风水沉溺之虞。其本镇变转有余者，亦可以就便移拨于他路，擘画发洩，或充折支赏给之用。凡此皆利源所出，莫非自然，无所侵扰，实为经久百世之利。今相度板桥镇委堪兴置市舶司”^①。

范锔从利国利民和利于商品流通诸多方面论述了海洋贸易的好处，事实也证明范锔之论确有见地。宋代两浙路市舶司的设立，虽然对商品自由流通有很大阻碍作用，但对海洋贸易的无序却是较好的规范，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尤其有利于国家动用行政手段与海外诸国进行大宗商品交易。神宗元丰七年（1084）二月，知明州马瑋根据朝廷旨令，“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磺五十万斤，乞每十万斤为一纲，募官员管押”^②。明州地方政府仅一次就从日本购回硫磺 50 万斤，远非普通私商所能办到，政权力量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而市舶司从中也抽取到较为丰厚的税利，一般年份仅明州市舶司在对日贸易中就能抽取税金两三万缗，而最多的宝祐五年（1257）则达到 67200 余贯。如果按照十五分抽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零九，哲宗元祐三年三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三，神宗元丰七年二月丁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一比例计算，仅明州一年对日贸易总额就高达30万~50万贯。

两宋时期以浙江为中心的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与日本。哲宗元祐四年（1089），高丽就遣使者至杭州；绍兴二十九年（1159）八月，“两浙市舶司言高丽贾人贩到铜器，乞收税出卖，诏付铸钱司”^①。孝宗乾道五年（1169），日本“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②。北宋时期，福建、浙江等地商人常到高丽进行商业贸易，“福建、两浙有旧贩高丽海商”就是如此^③。而“高丽国人常至明州商贩”^④，双方经贸互动频繁。当高丽贡使到宋境后，宋政府也给予丰厚回赐，回赐主要物品就是“浙绢”。“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说的就是此事^⑤。不论是民间私商贸易还是官方贡使往来，对于双边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都十分明显。

北宋明州虽然与高丽的主要贸易港口，但与日本也有较为频繁贸易往来，也是对日贸易重要窗口。史言：“宋开宝间初，许日本、琉球通市，乃置市舶于明州。”^⑥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等地商船都按照北宋政权之规定来宁波贸易。同样，该时期浙江商人也会远涉重洋赴海外贸易，日本、东南亚等地也都有浙江商人活动的印记。如南宋时的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外海数十年，未尝遭遇较大海上风险。但在高宗绍兴七年（1137），张愿“因涉大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外国七·日本国》，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神宗元丰元年五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己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⑥【清】求是斋主人：《时务分类文编》卷十八《商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亦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洋，遭风漂船，不知所届”。后历经传奇，终得以返回家乡^①。

中国与日本、高丽乃至东南亚一带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经济上各取所需的互补性较强。在宋代，日本的“螺钿”、“石硫磺”、“花布”、“倭刀”、“屏风”等就开始以贡物的形式进入中国^②。史载：日本的金子、砂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硫磺、螺头、合蕈、松板、杉板、罗板经由明州进入中国。尤其是日本“最宜木，率数岁成围。俗善造五色笺，错金为兰或为花，中国所不逮也，多以写佛经。铜器尤精于中国，贾舶乘东北风至”。高丽的银子、人参、麝香、红花、茯苓、蜡、大布、小布、毛丝布、松子、松花等也进入中国。同时从东南亚诸国输入浙江的商品多以香料为主，品种达30多种，主要有：麝香、笪香、沉香、丁香、檀香、山西香、龙涎香、降真香、茴香、没药、胡椒、槟榔、草澄茄、紫矿、画黄、蜡、辟口鱼鱼皮、暂香、速香、香脂、生香、粗香、黄熟香、鸡骨香、斩铍香、青桂头香、藿香、鞋面香、乌里香、断白香、包袋香、水盘香、红豆、草拨、良姜、益智子、缩砂、蓬莪术、三赖子、海桐皮、桂皮、大腹皮、丁香皮、桂花、姜黄、黄芦、木鳖子、茱萸、香柿、磕藤等^③。这些物品通过海洋贸易输入浙江，流通内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内容，其作用值得肯定。

南宋时期，明州作为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其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明州港不仅在北宋时期基础上有进一步拓展，更为重要的是明州港对外交往的范围广为拓展。南宋时期，明州除持续与日本、朝

① 【明】王世贞：《艳异编·续集》卷十《珍宝部·聚宝竹》，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日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罗潜：《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市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鲜进行友好往来和通商外，对外贸易的对象又扩展到与真里富国（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南洋及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与通商上。如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一位长期在明州经商的真里富国商人病死于明州，“真里富国大商死于城下，囊赀巨万，吏请没人。王曰：‘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为具棺殓，属其徒护丧以归。明年金人致谢曰：‘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来者且言死商之家尽捐所归之赀，建三浮屠，绘王像以祈寿，岛夷传闻，无不感悦，至今其国人以琛贡至，犹问王安否”^①。明州知府赵伯圭不仅没有吞没这位东南亚商人的财物，还派人护棺材归还他家乡。这种义举，深得真里富国民众的赞扬，更有利于双边的经贸交往。当时海外诸国的人贡与通商大多也从明州入境。阿拉伯商人在明州经商的人不断增加，不少人甚至长期寓居明州，因而在明州也出现了专门接待阿拉伯人的波斯馆。

南宋除明州港作为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之外，温州也是重要对外贸易港口。温州作为正式对外贸易港的出现时间是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前后。虽在唐代温州就与日本有较为密切的经贸往来，但其贸易地位并未得到官方认可。到宋代，温州经济进一步发展，“其货纤靡，其人多贾”^②。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后，更为温州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地域条件。因此，温州市舶务的设立主要与南宋定都临安有直接关系，温州相距临安距离并不遥远，设立市舶务并建

① 【宋】楼钥：《攻瑰集》卷八十六《行状·皇伯祖太师崇宪靖王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程俱：《北山集》卷二十二《外制·席益差知温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